

引用格式:饶育蕾,陈地强,费哲恒.政府帮扶对贫困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基于精准扶贫的政策评估[J].资源科学,2024,46(5):988-1001.[Rao Y L, Chen D Q, Fei Z H. Impact of government assistance on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poor households' consumption: Policy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J]. Resources Science, 2024, 46(5): 988-1001.] DOI: 10.18402/resci.2024.05.11

政府帮扶对贫困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

——基于精准扶贫的政策评估

饶育蕾,陈地强,费哲恒

(中南大学商学院,长沙 410083)

摘要:【目的】精准扶贫政策总体提升了贫困家庭的绝对福利水平,但在改善家庭相对福利,如消费相对剥夺的作用尚待讨论,上述问题的解答对现阶段政府帮扶政策如何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基于2013—2019中国家庭金融追踪调查(CHFS)数据,首先使用Kakwani指数法计算城市(省份)层面的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其次,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效果;最后,通过消费分类、引入扶贫方式交互项模型以及致贫成因异质性分析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靶向影响。【结果】①精准扶贫政策总体上降低了贫困家庭消费相对剥夺,但其经济效果较弱,在经过一系列安慰剂检验与匹配样本回归后结果仍然成立;②对消费类型、扶贫方式与致贫成因的进一步分类检验发现,贫困家庭在医疗保障与文教方面的消费相对剥夺因扶贫政策得到明显的减轻。因为保障型的扶贫政策如医疗保障、住房生活帮扶、子女教育帮扶能显著改善贫困家庭的消费福利,而其他发展型帮扶方式未能发现统计效力。【结论】精准扶贫政策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总体影响较弱,且集中于保障型扶贫政策如医疗帮扶与教育帮扶,未来政府帮扶需要在发展型帮扶上进行增效优化。

关键词:政府帮扶;精准扶贫;消费相对剥夺;Kakwani指数;双重差分法;中国

DOI: 10.18402/resci.2024.05.11

1 引言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这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在帮助贫困家庭摆脱绝对贫困上取得了标志性成就。政府对低收入家庭的帮扶重点也从脱贫转移到防止返贫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关于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到仍然要继续关注贫困家庭脱贫后的状况,坚持事前预防与事后帮扶相结合,防止脱贫人口返贫、边缘人口致贫。所以,需要了解前一阶段精准帮扶的政策效果,识别其中的长处与不足,为政府帮扶提质增效提供可能的方向。

已有研究表明精准扶贫政策确实显著提高了

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1-3]与消费水平^[4,5],甚至增进了家庭的人力资本积累与总体幸福感^[6,7],但这些研究多关注精准扶贫对家庭在时间维度的纵向影响,即相比于过去,贫困家庭的社会福利是否改善。少有关关注在横向上,精准扶贫政策是否也改进了家庭的相对福利水平?事实上,脱贫不仅仅是指绝对收入水平提高,也包含家庭的“相对贫困”,即对应的相对剥夺感也应当下降^[8]。2022年以来,政府提出发展要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更重要的是提升这部分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正因如此,本文尝试检验前期的精准扶贫政策是否降低了贫困家庭的相对剥夺。

收稿日期:2023-07-01;修订日期:2024-01-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91001019)。

作者简介:饶育蕾,女,四川资中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行为金融、资产定价、家庭金融。E-mail: yuleirao@sina.com

通讯作者:陈地强,男,江西赣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家庭金融、公司金融、金融史。E-mail: cdq_1993@csu.edu.cn

2024年5月

消费相对剥夺是从相对剥夺发展出来的研究领域。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表达的是个人在与同类群体比较后,因发现自己未能获得所期望的而其他人已经拥有所产生的强烈“被剥夺感”^[9]。在消费层面,这代表当个人占有的物品越高时,个人产生的被剥夺感会越低,如 Atsebi 等^[10]基于坦桑尼亚地区的调查数据发现当家庭相对消费水平较低时,会产生较高的被剥夺感与较低的主观幸福感。个体因更低的消费占有水平而产生被剥夺感正是消费相对剥夺的第一层含义,即家庭因追赶消费产生的心理成本。这是因为家庭的效用函数不仅受到过去消费水平的影响,也与周围其他人的消费水平有关^[11]。当家庭的消费低于参照组时,家庭的主观幸福感会下降,相对剥夺感上升。Chipp 等^[12]和 Kafle 等^[13]研究发现家庭尤为看重消费水平的社会比较,个人可能通过“攀比消费”“炫耀型消费”的方式降低消费上的被剥夺感,当无法通过追赶消费的方式实现时,甚至会选择移民。在中国,家庭也习惯于通过社会比较的方式来判断其获得、占有的水平,相关的学者观察到,当家庭所拥有的住房、医疗养老保障越多,而负债越少时,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感越低^[14-16]。而第二层含义着眼的是“相对贫困”(Relative Poverty),它表达的是虽然个人的生存条件已经得到改善,但个人仍可能处于较高的相对剥夺中,因为生活标准远远低于社会群体所期待的“美好生活”标准^[17-19]。Ravallion^[20]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研究,他认为关注贫困家庭需要重视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指的是个人的生存必需品剥夺(如缺乏足够的水、食物、药品),而相对贫困强调的是个人因相对生活水平较低而产生的被剥夺感。本文所讨论的消费相对剥夺聚焦的是它的第二层含义,因为检验的是精准扶贫的消费福利效应。由于精准扶贫政策关注的是存在贫困脆弱性的群体,这部分群体在过去处于绝对贫困中,缺乏许多基本的生存物品。精准扶贫政策首先是帮助该类群体摆脱绝对贫困,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在绝对贫困基本解决后,下一阶段的政府帮扶目标转变为“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即提升这些脆弱性家庭的美好生活水平。所以,了解精准扶贫政策在缓解家庭相对贫困上做到了什么、又有哪些没做好,能帮

助完善下一阶段的政府帮扶政策,这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使用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数据,以家庭是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识别贫困家庭与非贫困家庭,以相对于同市(同省)其他家庭的消费相对排名指数(Kakwani 指数)作为相对剥夺代理变量,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政府帮扶与消费相对剥夺的关系。

本文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补充了关于精准扶贫政策效果的研究。目前对精准扶贫的政策分析大多着眼于绝对贫困,即关注家庭的绝对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教育投资是否从中获益^[2,4,6]。本文从相对贫困维度,分析了扶贫政策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作用,拓展了这方面的研究。第二,丰富了关于中国家庭消费相对福利的研究。现有关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普通家庭在住房、医疗等方面的消费比较^[14-16]以及数字金融在其中的作用^[21,22],却较少关注贫困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如何变化。最后,当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要求重点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福利,本文对贫困家庭消费福利的分析为下一阶段政府帮扶精准优化提供了政策启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精准扶贫政策背景

2013年,政府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是在原有区域扶贫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帮助发展动力不足的家庭跨越贫困陷阱,解决贫困家庭“最后一公里”难题^[23]。换言之,精准扶贫战略的特点在于政府直接帮扶具体的贫困家庭,针对每一个贫困家庭的致贫原因提供相匹配的帮扶措施。相比于过去的区域开发式扶贫,精准扶贫结合了运用专向资金支持、区域协同的开发式帮扶和以保护为导向的保障型帮扶,聚焦于改善家庭在基本衣食、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安全住房、饮水安全等多个维度的贫困脆弱性(相关帮扶政策被总结为“两不愁,三保障”)^[24,25]。

具体实施上,政府首先借助于基层干部识别贫困家庭的经济条件建立每一个贫困家庭的贫困档案。第二步,针对每一个贫困家庭,政府会指派专门的帮扶干部,由该帮扶干部定期定点了解贫困家

庭基本情况、帮助贫困家庭领取基本政府补助,帮扶干部需要定期向政府汇总贫困家庭经济改善情况以及还需改进的空间。在对贫困家庭信息精确掌握的基础上,中央及省一级政府会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制定专项帮扶计划,例如医疗帮扶、教育帮扶、生活帮扶、农业帮扶、就业帮扶、金融帮扶等^[23]。这些不同领域的专项帮扶覆盖了可能造成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各个领域,聚焦于为贫困家庭创造就业条件和稳定的收入来源。最后,在专项扶贫政策启动后,每年上级政府和第三方机构都会对减贫成效进行严格评价。图1为本文基于相关政策文件所总结的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

总之,在这场全景式的扶贫行动中,政府建立了两种针对性的帮扶渠道,一方面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政府补偿等保障性措施提高家庭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应用开发性措施,全面提升贫困家庭的发展潜力,改善家庭在资金、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等方面的局限。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以

后,中央政府正式提出“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强调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3 数据来源、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3.1 数据来源

微观数据来自于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是由西南财经大学家庭金融研究中心组织开展的每两年进行一次的追踪调查,在连续4次调查中,涵盖全国29个省级行政区^①(22个省、3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345个县(区、县级市),总样本达4万余户家庭。调查对象包括样本家庭的全部成员,且详细记录了居民的家庭收支情况。相比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等全国大型公开调查数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2019年调查中详细询问了扶贫项目具体帮扶手段,各项补助金额等信息,有效解决了其他调查问卷在建档立卡贫困户上信息不足等问题,为研究提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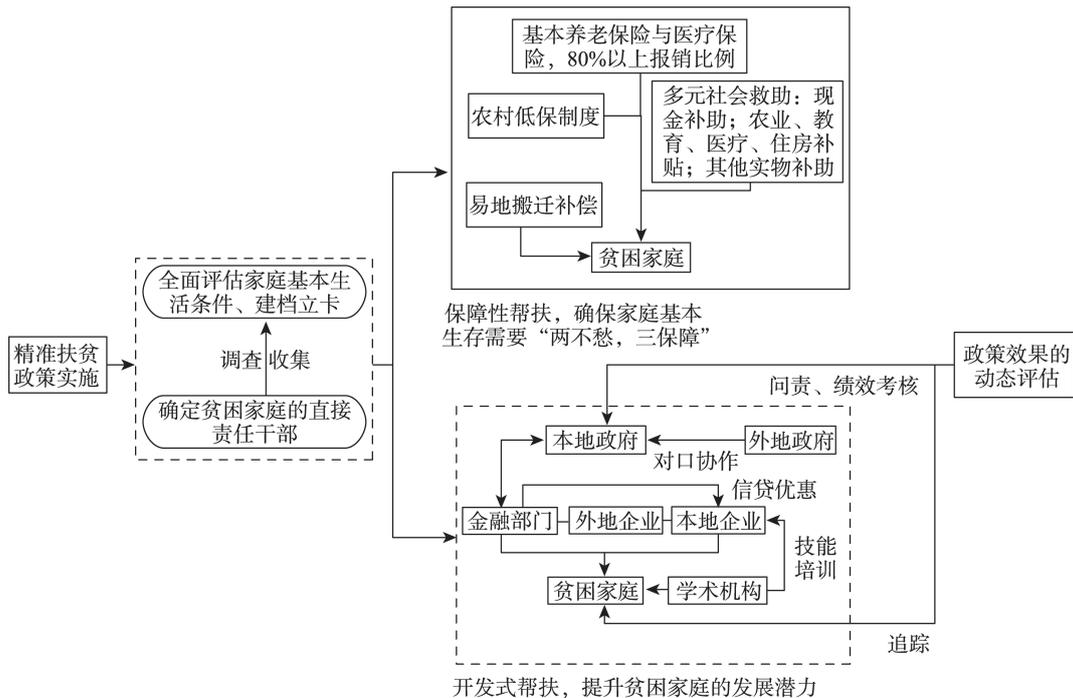


图1 精准扶贫实施过程

Figure 1 Intervention process for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资料来源:中国减贫四十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2022^[23]

① 家庭金融调查并未包含西藏、新疆以及港澳台地区。这是因为该调查为追踪调查,需要确保上一轮被访家庭在新一轮中也能再次接受调查,所以暂未包含访问难度较大的地区。

2024年5月

直接的数据支撑。

消费、收入等变量为家庭被访问前一年的实际情况,即2013年、2015年、2017年与2019年的调查问卷对应为2012年、2014年、2016年与2018年的度量记录。本文根据精准扶贫政策的发生时间,保留政策发生前两期(2012年与2014年)与政策发生后两期(2016年与2018年)的样本信息,运用4期面板数据展开研究,在剔除未连续4次受到调查的样本以及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后得到7513户家庭,这7513户家庭在2013、2015、2017与2019年都有观察数据,所以最终样本数达30052(7513×4)。

3.2 变量定义

3.2.1 核心解释变量:是否为贫困户

本文关注的是政府所认定且受到帮扶政策影响的贫困家庭。在西南财经大学家庭金融调查问卷中,按照家庭是否是政府“建档立卡”认定的贫困户确定家庭是否属于贫困户(表1),以2017年与2019年问卷中被访者对问题“目前,您家是否为贫困户”的回答来识别家庭是否属于受帮扶的贫困家庭,若在这两年中,家庭回答是,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此外为巩固政策效果,中国坚持脱贫不撤档,所以即便部分家庭之前属于贫困户但之后脱贫了,这部分家庭仍旧被视为受到政府帮扶影响的家庭。统计发现,在这7513户追踪家庭中,属于贫困户的家庭为507户,非贫困户家庭达7006户。

3.2.2 被解释变量:消费相对剥夺

借鉴张雅淋等^[4]、李晓飞等^[6]的研究设计,将家

庭消费相对剥夺定义为家庭消费水平在同群家庭的相对排名,当家庭消费水平相对排名越后,家庭的消费被剥夺感越强烈。而家庭消费水平代表的是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消费支出包括了食品、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娱乐、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和其他支出。在实证中,使用Kakwani指数来测算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Kakwani指数计算思路是选取家庭所在区域(同市或同省)的其他个体作为参照,将受访家庭与其所在区域内消费性支出水平更高的其他家庭进行比较。为保证家庭之间消费的可比性,分别计算出各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假定以某市为研究区域,该区域共有n个家庭,所有家庭消费的平均水平为 μ_x 。该市每个家庭的人均消费为: x_1, x_2, \dots, x_n ,且有 $x_1 \leq x_2 \leq \dots \leq x_n$,存在部分家庭的消费水平高于家庭i,当家庭i与这些家庭之间的总消费差距越大时,家庭i感知到的消费相对剥夺越大,最终定义家庭i感知到的消费相对剥夺:

$$Kak_i = \frac{1}{n\mu_x} \sum_{j=i+1}^n (x_j - x_i) = \gamma_{x_i}^+ \left[\frac{(\mu_{x_i}^+ - x_i)}{\mu_x} \right] \quad (1)$$

式中: μ_x 为地区所有家庭人均消费水平的均值; x_j, x_{j+1}, \dots, x_n 代指的是所有在家庭人均消费上高于家庭i的样本; $\gamma_{x_i}^+$ 为 x_j, x_{j+1}, \dots, x_n 样本数量占全部家庭比例; $\mu_{x_i}^+$ 代指 x_j, x_{j+1}, \dots, x_n 的均值。观察家庭消费相对剥夺计算过程,可知Kakwani指数具有如下性质:①与家庭消费水平 x_i 负相关;②若家庭消费为0,代表

表1 变量及定义

Table 1 Variables and their definition

变量	符号	描述
消费相对剥夺	<i>Kakc</i>	市级家庭人均消费相对剥夺指数
	<i>Kakp</i>	省级家庭人均消费相对剥夺指数
是否为贫困户	<i>Treat</i>	非贫困户家庭 <i>treat</i> =0; 建档贫困户家庭 <i>treat</i> =1
户主年龄/岁	<i>Age</i>	户主年龄
户主婚姻	<i>Married</i>	户主若为已婚,取1,否则取0
户主教育年限	<i>Edu</i>	没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职高、大专/高职、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分别定义教育年限为:0、6、9、12、12、15、16、19、22年
家庭成员健康水平	<i>Health</i>	家庭成员自评身体状况得分的均值,取值1~5,越低越健康
家庭人均收入/元,取对数	<i>lninc</i>	ln(上一年家庭人均收入+1),人均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农业收入、工商业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家庭净资产/元,取对数	<i>lnreq</i>	ln(家庭资产-负债+1),家庭资产包括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
农村家庭	<i>Rural</i>	家庭居住地是否属于农村,农村=1;城镇=0

家庭感知到的消费相对剥夺最高,此时 *Kawani* 指数为 γ_x^+ , 接近于 1, 当家庭消费支出为所在区域最高水平时, 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最低; ③ *Kawani* 数值越大, 表明该家庭的平均消费水平占所在群体的比例越低, 消费被剥夺程度越大。由于本文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同一家庭在不同年份所在参照群体中的相对位次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消费相对剥夺指数是分年份、分地区计算。实证设计中以省级样本、市级样本为相对剥夺范围计算了两类相对剥夺指数: $Kakp_i$ 代表家庭 *i* 相对同省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水平, $Kakc_i$ 代表家庭 *i* 相对同市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水平。以地级市或省域作为计算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研究区域是因为考虑到: ① 保证 *Kakwani* 指数的代表性, 虽然在实际中家庭更可能以所在社区或者所在县城作为消费的参照系, 但因为调查问卷中社区内部的追踪家庭数相对较少, 这可能会导致估计偏差; ② 与主流文献保持一致。最近几年的相近研究, 如杨碧云等^[22]、栾炳江等^[26]以及张海洋等^[27], 都以市级区域作为计算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参照组, 这为本文的测算标准提供了支撑。

3.2.3 控制变量

变量选取主要参照两方面的研究, 其一为关于精准扶贫对家庭绝对消费水平影响的研究, 如尹志超等^[4]、Chang 等^[28]; 另一方面为讨论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研究, 如张雅淋等^[14]、杨碧云等^[22]。综合两方面文献, 首先选取会影响家庭成为贫困户的相关特征, 控制户主的年龄、婚姻、教育年限与家庭成员健

康状况。在家庭经济特征方面, 为避免重复控制, 控制了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净资产, 家庭人均收入为总收入/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净资产为资产与负债之差。地区特征为家庭居住地是否属于农村。

3.2.4 变量基本描述

表 2 报告了非贫困户与贫困户的基本家庭特征。总样本描述性统计显示, 贫困户家庭比例为 6.74%, 与尹志超等^[4]的研究一致。从消费相对剥夺的比较看, 家庭总体的消费相对剥夺为 0.429, 被访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处于较高水平, 表明了当前中国的家庭消费不平等水平较高。此外, 数据显示贫困户的消费相对剥夺水平远高于非贫困户, 是非贫困户的 1.2~1.5 倍。同时, 就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家庭特征看, 贫困户家庭的户主受教育年限较短, 家庭成员自评健康较差, 且家庭净资产与人均收入较少, 分布在农村地区为主。最后, 结合全样本的描述性特征可知, 被研究对象基本为农村家庭, 且家庭户主的年龄都相对偏高。

3.3 模型设定

3.3.1 基准模型

要有效识别精准扶贫的政策效应, 需要确定受政策影响的处理组与未受政策干预的控制组, 在控制未受干预组消费相对剥夺变化后, 才是精准扶贫政策的净效应。为此参考尹志超等^[4]的设计, 采用政策评估的经典计量方法—双重差分(DID)法—来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消费相对剥夺产生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表 2 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	全样本			非贫困户			贫困户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差
<i>Kakc</i>	30052	0.429	0.255	28024	0.422	0.254	2028	0.524	0.244
<i>Kakp</i>	30052	0.462	0.252	28024	0.453	0.251	2028	0.595	0.222
是否为贫困户	30052	0.067	0.251	28024	0.000	0.000	2028	1.000	0.000
户主年龄/岁	30052	55.157	12.851	28024	55.053	12.832	2028	56.741	13.007
户主婚姻	30052	0.880	0.309	28024	0.88	0.320	2028	0.86	0.246
户主教育年限	30052	8.372	3.924	28024	8.56	3.885	2028	5.786	3.517
家庭成员健康水平	30052	2.960	1.090	28024	2.929	1.068	2028	3.401	1.128
家庭净资产/元, 取对数	30052	12.461	1.469	28024	12.135	2.510	2028	10.478	2.930
家庭人均收入/元, 取对数	30052	8.844	1.861	28024	10.027	2.208	2028	9.177	1.941
农村家庭	30052	0.492	0.499	28024	0.469	0.499	2028	0.819	0.385

2024年5月

$$Kakc(p)_{i,t} = \gamma_0 + \gamma_1(Year2015_t \times Treat_i) + \sum Control_{i,t} + \mu_i + \tau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式中: $Kakc(p)_{i,t}$ 表示家庭*i*在第*t*期内相对于市内其他家庭(同省其他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水平;变量 $Year2015_t \times Treat_i$ 为政策冲击与处理组的交互项; γ_1 表示精准扶贫的政策效应。其中 $Year2015_t$ 为政策冲击的时间虚拟变量,由于2015年以后政府开始全面开展对贫困户的建档立卡工作,故而定义2016—2018年为政策冲击后的年份,2012—2014年为政策冲击前的年份。所以,当 $t > 2015$ 时, $Year2015_t = 1$,否则为0。 $Treat_i$ 为是否受到政府帮扶的贫困户家庭,即政策处理变量。若该家庭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Treat_i = 1$,否则为0。 $\sum Control_{i,t}$ 为家庭与个人层面随时间变动且影响消费的控制变量(户主性别、家庭规模因不随时间变化而未纳入)。 μ_i 为家庭固定效应; τ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尾项。同时,为保证估计的稳健性,所有回归的系数标准误都经过了家庭层面的聚类调整。

3.3.2 平行趋势检验模型

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政策效应的前提是政策实施是随机的,即受政策冲击组与未受冲击组在实施干预前应当不存在明显的差异。所以,为了验证精准扶贫的非随机性干预是否造成了较大的估计误差,尝试检验在政策干预前,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家庭消费福利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借鉴平行趋势检验的常规方法^[29,30],定义每个时点相对于建档立卡年份(2015年)的相对时间虚拟变量($t-3, t-1, t+1, t+3$),并以 $t-1$ 期(即2014年)为比较基期。建立平行趋势检验模型如下:

$$Kakc(p)_{i,t} = \gamma_0 + \gamma_1(Shock_{t-3} \times Treat_i) + \gamma_2(Shock_{t+1} \times Treat_i) + \gamma_3(Shock_{t+3} \times Treat_i) + \sum Control_{i,t} + \mu_i + \tau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式中: $Shock_{t-3}, Shock_{t+1}, Shock_{t+3}$ 分别为受政策影响前3年,受政策影响后1年,受政策影响后3年的时间虚拟变量,若政府帮扶的非随机性干预造成的偏差较弱,应当预期 γ_1 不显著,而 γ_2, γ_3 显著为负。

3.3.3 稳健性检验模型

(1) 安慰剂检验

模型(2)的另一个疑问为是否该基本结果仅是

精准扶贫的政策干预引起。因为在实证设计中,以2015年作为政策冲击的发生时点,但2015年也同样有其他相似的政策出台。那么如何保证基本结果是因为精准扶贫政策造成的呢?由于无法验证所有的政策效应,所以采用了设置虚拟“处理组”的思路进行安慰剂检验^[31]。具体设计为,从非贫困户中随机抽取507户组成伪处理组,将其设定为“伪”贫困户,并基于“伪”贫困户重新生成处理组变量再估计模型(2)。为了进一步避免其他小概率事件的影响,进行500次模拟回归,报告每次模拟的交互项系数与对应*P*值。若基本结果主要是因为精准扶贫政策所致,可以预期真实的处理组效应要远远高于随机生成的虚拟处理组效应。

(2) 倾向得分匹配

双重差分法的另一个适应性条件为受干预组与非干预组之间除政策干预外不存在其他明显差异^[32]。但本文使用样本可能并不满足此条件,因为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在家庭基本特征上存在较大差异。为降低样本选择性偏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rosperity Score Matching, PSM),选取建档立卡前一年的样本,为贫困户匹配特征相似的非贫困户,匹配特征包括:户主年龄、户主婚姻状况、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成员健康水平、家庭人均收入、家庭净资产。使用1:1无放回近邻匹配计算出每个家庭的匹配得分后,以匹配后的样本重新估计模型(2)。

(3) 其他方面的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西南财经大学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最新公开数据仅至2019年,为此使用北京大学家庭追踪调查(CFPS)作为补充性检验。运用2010、2012、2014、2016、2018、2020年共6轮的CFPS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基于2020年CFPS问卷问题“您家是否为建档立卡户,您家是哪一年建档立卡”确定贫困户家庭样本,并以2016、2018、2020年为政策干预年份,2010、2012、2014年为政策干预前年份。未清洗样本前,发现在CFPS问卷中,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为853户,与CHFS问卷贫困户数量基本接近。随后,运用相似的清洗方法,保留了连续6年的追踪家庭,在删去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后剩下了6447户家庭。为降低回归结果的偏差,以政策干预前一年被调查问卷的家庭特征作为筛选标准,运用倾向得分匹配1:1近邻匹配获得与贫困户相似的非贫困户样

本,并以筛选后的样本作为回归样本。另外,也尝试计算出以社区为参照组的家庭消费相对剥夺。首先,以家庭金融调查中连续4年社区ID保持一致作为主要样本,删去社区ID不连续、社区内家庭数不足2户以及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保留了7452户家庭。随后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筛选对照样本。以上稳健性检验均在模型(2)基础上进行。

3.3.4 精准扶贫异质性效果分析

为了全面了解精准扶贫政策影响贫困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效果,基于消费类型、扶贫方式、致贫成因进行不同形式的分类检验。通过上述分类检验能帮助识别扶贫政策对贫困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微观作用,例如精准扶贫政策产生显著效果的细分消费、扶贫方式与特殊贫困群体,这能明确精准扶贫在改善贫困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积极作用与相对不足,为现阶段政府帮扶优化提供政策启示。

(1) 消费类型分类检验

精准扶贫主要通过保障性措施和开发扶持型政策来帮助贫困家庭摆脱贫困陷阱。保障性措施就是首先保障贫困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两不愁,三保障”即为典型代表。而开发式帮扶着眼于给家庭提供技术支持、就业创业支持、资金支持,使家庭成员获得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提高家庭收入。不难预期:保障性措施主要影响的是家庭衣食住行等生存型消费,而开发型政策更可能影响家庭发展型消费。所以,通过对比消费结构的内部差异,能了解精准扶贫政策主要影响的细分消费。基于CHFS问卷中统计的8类细分消费(包含食品、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娱和其他)支出,以同样的方式计算这8类消费在市级层面的Kakwani相对剥夺指数^②。为了保证估计的可信度,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获得相似样本后再估计精准扶贫对8类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回归设定与模型(2)一致。

(2) 扶贫方式分类检验

除了分析不同消费类型的影响外,本文也进一步检验了不同帮扶方式的效果差异。在2019年家庭金融调查中,问卷统计了不同的帮扶方式,包括“生活、住房、医疗、教育、农业生产、金融、就业以及

其他帮扶”。而这些扶贫方式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保障贫困家庭的基本需求、提升家庭的发展潜力。为验证政府扶贫方式的异质性作用,基于不同的扶贫方式建立政策干预虚拟变量,建立估计模型如下:

$$Kakc_{i,t} = \beta_0 + \beta_1(Year2015_t \times Treat_t \times Help_i) + \sum Control_{i,t} + \mu_i + \tau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式中: $Kakc_{i,t}$ 为市级层面的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水平^③; $Help_i$ 为帮扶方式虚拟变量,若被访家庭接受了某一类帮扶(例如生活帮扶)则该项帮扶赋值为1,否则为0。 β_0 为常数项; β_1 表明的是仅受到特定帮扶方式影响的贫困户在受到扶贫政策影响后相比于其他群体的消费相对剥夺变动情况。为减少估计偏差,仍使用倾向得分匹配1:1匹配算法获得与贫困家庭基本特征相似的群体,并基于匹配后样本估计模型(4)。

(3) 致贫成因分类检验

基于致贫成因将贫困户分为多个类别,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在不同贫困户中的影响差异,以便确认精准扶贫的影响渠道。在CHFS2019的问卷中,问题“您家成为贫困户/低保户的原因有哪些?”单独询问了贫困户的致贫成因,选项包括“因病致贫、因残致贫、子女上学、遭受自然灾害、受教育水平低、没有劳动力、缺少资金、缺少技术”。其中,主要的致贫原因是因病致贫(51.5%)、没有劳动力(33.5%)、因残致贫(28.2%)、缺乏资金(20.9%)、子女教育(8.9%)、缺乏技术(7.7%)。通过分离出不同致贫成因的贫困户作为处理组,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匹配对应的非贫困户作为控制组,最终运用模型(2)检验精准扶贫对这些分样本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

4 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表3是回归模型(2)的估计结果。列(1)为仅控制时间与家庭固定效应结果,列(2)为加入了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后精准扶贫对市级相对剥夺影响,列(3)为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省级相对剥夺指数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家庭与个人特征后,政府使用精准扶贫政策能显著降低贫困家庭的

② 本文也基于省级层面计算了8类细分消费的相对剥夺情况,但由于结果相似,为节省篇幅而未展示,结果备索。

③ 也基于省级层面计算了8类帮扶方式的估计效果,但由于结果相似,为节省篇幅而未展示,结果备索。

2024年5月

表3 精准扶贫政策对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

Table 3 The impa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on relative consumption deprivation

变量	(1) <i>Kakc</i>	(2) <i>Kakc</i>	(3) <i>Kakp</i>
是否为贫困户×Year2015	-0.019* (-1.88)	-0.021** (-2.01)	-0.028*** (-3.03)
户主年龄		-0.001** (-2.37)	-0.001*** (-2.75)
户主婚姻		-0.079*** (-4.78)	-0.078*** (-5.06)
户主教育年限		-0.001 (-0.85)	-0.000 (-0.55)
家庭成员健康水平		-0.003 (-1.60)	-0.004** (-2.32)
家庭净资产		-0.013*** (-8.80)	-0.014*** (-10.14)
家庭人均收入		-0.002*** (-3.19)	-0.002*** (-3.17)
农村家庭		0.014 (0.84)	0.018 (1.09)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家庭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观测值	30052	30052	30052
<i>R</i> ²	0.042	0.048	0.074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经家庭层面聚类调整标准误计算的*t*值。下同。

消费相对剥夺水平,且均在5%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在缓解消费不平等上具有一定效果。但系数的经济含义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家庭的消费相对福利改善程度较弱:市级层面的交互项系数为-0.021,对应系数的经济显著性为0.009,即解释变量系数与标准差乘积绝对值再比上被解释变量样本均值,该系数表明政府帮扶前家庭贫困概率提高1个标准差,则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下降0.009。从控制变量看,户主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资产与收入状况能显著降低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感,因为该4类特征能直接影响家庭的消费能力与消费倾向,由此影响家庭的横向消费效用。

4.2 稳健性检验

虽然基准回归已尽可能控制了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特征以及随时间变化的共变特征。但由

④ 省级层面的结果与市级相似,读者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⑤ 图3为市级层面的安慰剂检验结果,省级层面的结果与市级相似,读者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⑥ 为验证匹配后样本是否与匹配前相似,本文也对匹配前后的家庭特征进行了组间差异检验,确保匹配后的样本基本无显著差异。

于精准扶贫政策影响的是贫困户家庭,而家庭是否入选贫困户并非随机,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在家庭经济特征上差异较大,这可能已经违背了双重差分模型的适用条件^[29]。为此,使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以及其他稳健性思路来验证精准扶贫对贫困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效果。

4.2.1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模型(3)估计后,将模型(3)的3项交互项回归系数绘制成图(图2)。为避免结果重复,图2仅为市级层面的家庭消费相对剥夺估计结果^④。结果表明, γ_1 估计系数为0.04($t > 2$),至少在统计上表明政策干预前,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消费相对剥夺存在明显差异,且贫困户的消费相对剥夺感较高。而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交互项的系数逐渐显著为负。综上可知,使用平行趋势方法估计后发现,政策干预组与控制组之间差异较为明显。

4.2.2 安慰剂检验

图3显示了安慰剂检验的系数与*P*值分布^⑤,虽然多数估计系数分布在0值附近,但真实值(垂直虚线)并非远异于模拟值。这表明基本回归中报告精准扶贫效果可能仍旧存在偏差。

4.2.3 倾向得分匹配^⑥

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寻找与贫困户在家庭特征相似的样本,最终获得992户匹配家庭,贫困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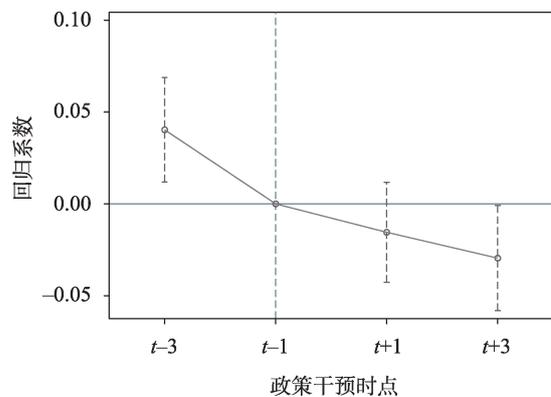


图2 市级层面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时间趋势检验

Figure 2 Temporal trend tests of relative consumption deprivation at city level

注:圆点的虚线为95%统计水平上的置信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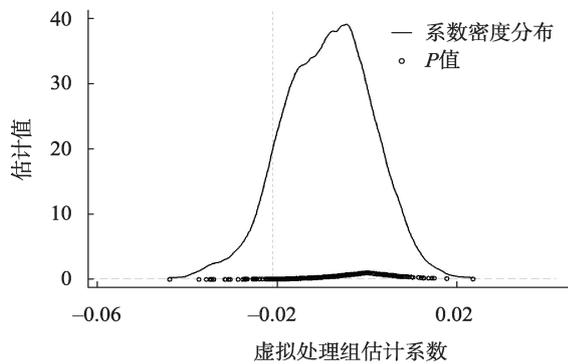


图3 精准扶贫政策的安慰剂检验

Figure 3 Placebo test for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与非贫困家庭分别为496户。随后,以匹配后的样本重新估计了模型(2)。表4报告了倾向匹配后的回归结果,整体结果与全样本基本一致,显著性略有下降,市级层面与省级层面的影响系数已经相近,但其统计的显著性并不高,也仅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并且,影响系数仍旧偏低。可见,即便在保证干预组与未干预组的可比性之后,精准扶贫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改善也较为有限。

4.2.4 其他方面的稳健性检验

使用北京大学家庭追踪调查(CFPS)作为补充

表4 经PSM调整后精准扶贫对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

Table 4 The impa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on relative consumption deprivation after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变量	(1) <i>Kakc</i>	(2) <i>Kakp</i>
是否为贫困户×Year2015	-0.025* (-1.71)	-0.026* (-1.93)
户主年龄	-0.001 (-1.03)	-0.001 (-0.89)
户主婚姻	-0.001 (-0.01)	-0.020 (-0.78)
户主教育年限	-0.004*** (-1.99)	-0.004*** (-2.24)
家庭成员健康水平	-0.005 (-1.11)	-0.006 (-1.53)
家庭净资产	-0.024*** (-8.47)	-0.014*** (-3.84)
家庭人均收入	-0.015*** (-3.84)	-0.026*** (-10.87)
农村家庭	-0.003 (-0.09)	0.106*** (-3.05)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家庭固定效应	Yes	Yes
观测值	3868	3868
R ²	0.069	0.104

性检验,同时也计算出以社区为参照组的家庭消费相对剥夺进行替代性检验。由表5可知,使用北京大学家庭追踪调查的估计结果(列(1)精准扶贫政策系数为-0.026)和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估计结果(表4列(1)精准扶贫对市级消费相对剥夺影响系数为-0.025)非常接近,该结果减轻了对精准扶贫政策时效性偏差的担忧。当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社区维度的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后,精准扶贫的影响系数下降至-0.015,并且已经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仍旧支持本文论点即精准扶贫对家庭消费的相对福利影响较弱。甚至,进一步区分不同的消费类型时(表6),发现医疗方面的政策帮扶作用最为明显。综上可知,在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以及社区维度的家庭消费相对剥夺作为稳健检验后,本文核心结论仍旧成立。

4.3 精准扶贫异质性影响分析

为准确识别精准扶贫政策的微观效果,从消费类型、扶贫方式以及致贫成因方面检验精准扶贫对贫困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异质性影响。

4.3.1 家庭消费类型的分类检验

在进行消费分类检验前,使用倾向得分匹配获得与贫困户家庭特征相似的非贫困户样本,倾向匹配方式与特征选择都与稳健性检验保持一致,最后分别获得496户贫困户家庭与496户非贫困家庭。表7报告了精准扶贫对8类消费类型相对剥夺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干预仅对医疗和文教两方面的消费

表5 替换数据源与消费相对剥夺计算维度检验

Table 5 Tests of sample replacement and substitution of explained variable measurement

	(1) 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市级,CFPS)	(2) 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村级/社区级,CHFS)
是否为贫困户× Year2015	-0.026* (-1.88)	-0.015 (-1.05)
控制变量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家庭固定效应	Yes	Yes
观测值	8286	3859
R ²	0.093	0.036

注:控制变量包括户主年龄、家庭成员健康水平、户主教育年限、户主婚姻状况、家庭净资产、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居住条件(是否为农村家庭)。下同。

表6 村级(社区级)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分类检验

Table 6 Categorical test for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at the village (community) level

	(1) 食品	(2) 衣着	(3) 医疗	(4) 居住	(5) 交通	(6) 文教	(7) 日用	(8) 其他
是否为贫困户× Year2015	-0.004 (-0.30)	-0.005 (-0.29)	-0.032* (-1.87)	0.015 -1.02	-0.004 (-0.34)	-0.011 (-0.75)	0.008 -0.55	-0.004 (-0.3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家庭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3859	3859	3859	3859	3859	3853	3832	3741
R ²	0.033	0.085	0.061	0.164	0.1	0.011	0.334	0.873

表7 精准扶贫对8类细分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

Table 7 The impa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on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different consumptions

变量	(1) 总消费	(2) 食品	(3) 衣着	(4) 医疗	(5) 居住	(6) 交通	(7) 文教	(8) 日用	(9) 其他
是否为贫困户× Year2015	-0.025* (-1.71)	-0.003 (-0.19)	-0.018 (-1.17)	-0.043** (-2.43)	0.023 (1.52)	-0.000 (-0.03)	-0.026* (-1.67)	0.024* (1.72)	0.026** (2.0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家庭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3868	3868	3868	3868	3868	3868	3868	3868	3868
R ²	0.069	0.062	0.070	0.061	0.167	0.101	0.018	0.358	0.156

相对剥夺具有一定的改善效果,而日用品与其他消费显示出贫困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感反而在上升,其他如食品、衣着、居住、交通通信方面的作用并无统计支持。结合精准扶贫的政策导向,可知政府对贫困家庭的衣食住行、医疗、就业、农业生产等各个方面都有对应的帮扶政策,而不同帮扶政策的支持力度与覆盖面存在差异,这可能是造成表7结果存在异质性的主要原因。

4.3.2 扶贫方式分类检验

基于模型(4)来检验不同扶贫方式对贫困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为减少估计偏差,在估计前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获得与贫困家庭特征相似的非贫困家庭,匹配过程与前文一致,最终分别获得506户贫困户与506户非贫困户。表8报告了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医疗帮扶与住房帮扶能显著改善贫困家庭的消费福利水平,并且是医疗帮扶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影响最大。然而,其他开发性帮扶方式

如教育帮扶、就业帮扶、生产帮扶、金融帮扶并不能产生显著效果。结合表7与表8,基本可以判断精准扶贫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主要是保障性帮扶措施的作用,而开发型帮扶的政策效果并未得到支持。

4.3.3 致贫成因分类检验^⑦

消费类型与扶贫方式的分类检验结果表明保障性帮扶政策,如医疗保障与教育补助对贫困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更为明显,因为贫困家庭在医疗与社会保障支出、教育支出方面的消费相对剥夺得到显著改善,接下来针对致贫成因验证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群体的异质性作用。表9显示,精准扶贫能够显著改善因病致贫、因子女教育致贫、因自然灾害致贫以及因缺乏劳动力致贫的贫困户的消费相对剥夺,而自然灾害致贫受到的影响最大。该结果同样说明保障性政策如医疗帮扶、义务教育帮扶和基本生活帮扶更能影响家庭的消费福利,而发

⑦ 本文也检验了精准扶贫政策的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只有在西部地区,精准扶贫政策存在较强的政策效应,这与表8的结论是相似的。因为西部地区主要的致贫成因就在于许多基础服务设施的缺乏,如医疗资源、保险体系、教育资源,导致贫困家庭的生存性风险较高。为避免结论重复而未在此展示,结果备索。

表8 不同帮扶方式对贫困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市级)的影响

Table 8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government supports on relative consumption deprivation of households in poverty

	(1) 医疗	(2) 教育	(3) 住房	(4) 生活	(5) 农业生产	(6) 金融	(7) 就业	(8) 其他
帮扶类型×是否为贫困户×Year2015	-0.050** (-2.58)	-0.004 (-0.14)	-0.046*** (-2.67)	-0.020 (-1.12)	-0.037 (-1.40)	-0.031 (-0.81)	-0.011 (-0.16)	0.011 (0.6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家庭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4048	4048	4048	4048	4048	4048	4048	4048
R ²	0.075	0.073	0.075	0.073	0.073	0.073	0.073	0.073

注:帮扶类型分为医疗、教育、住房、生活、农业生产、金融、就业和其他帮扶,具体模型定义见式(4)。

表9 精准扶贫对贫困户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市级)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Table 9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on poor households

	(1) 因病致贫 贫困户	(2) 因残致贫 贫困户	(3) 子女教育 致贫贫困户	(4) 自然灾害 致贫贫困户	(5) 低教育致贫 贫困户	(6) 缺乏劳动力 致贫贫困户	(7) 缺乏资金 致贫贫困户	(8) 缺乏技术 致贫贫困户
是否为贫困户×Year2015	-0.030* (-1.67)	-0.025 (-1.13)	-0.085*** (-2.67)	-0.123** (-1.98)	-0.001 (-0.04)	-0.039** (-2.00)	-0.005 (-0.20)	-0.008 (-0.2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家庭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940	2568	2172	2056	2148	2636	2376	2160
R ²	0.073	0.085	0.086	0.084	0.081	0.073	0.078	0.084

展型帮扶如提供资金、技术、生产帮助方面的影响则相对较弱。

总之,结合表7、表8与表9的分析,可以总结认为:①精准扶贫政策主要通过改善家庭的生存型消费如子女教育支出、医疗支出而影响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对其他发展型消费与享受型消费影响较弱,因而造成精准扶贫的总体效应并不强;②精准扶贫政策主要通过医疗帮扶、义务教育帮扶、住房等生活帮扶来改善家庭的消费福利,表明保障型扶贫政策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作用,而开发型扶贫政策的效果相对较弱。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结论

运用2013—2019西南财经大学家庭金融调查的4轮追踪数据,本文验证了2015年以来政府大规模的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精准扶贫政策总体改善了贫困家庭的相对

福利状况,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有了显著的下降。但在政策影响的经济重要性上,基准结果显示精准扶贫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有限,表现在相比于特征相似的非贫困家庭,贫困家庭消费相对剥夺仅下降了0.021(市级层面),而且只在医疗消费、文教消费方面有相对明显的效果。

(2)通过对家庭的消费结构、精准扶贫帮扶方式以及不同致贫成因的异质性分析,本文认为政策效应受限的主要原因在于精准扶贫政策以“医疗帮扶、生活帮扶、义务教育帮扶”等保障型政策为主,大部分贫困家庭的相对消费剥夺也是在这些方面得到了改善。然而,开发型帮扶政策无论是在支持力度还是在政策效果上都相对较差,就业帮扶、生产帮扶与金融帮扶都没有明显的效果,甚至因缺乏资金与技术致贫的家庭在受到政策帮扶后也未在消费福利上明显改善。

5.2 政策启示

本文对精准扶贫的政策效果分析具有丰富的

2024年5月

政策启示:

(1)本文发现精准扶贫的政策效果集中在保障型政策上,而这些政策主要影响的是贫困家庭的生存型消费结构,这也表明当下摆脱贫困的家庭仍旧存在一定的脆弱性。所以,在强调“乡村振兴”“防止返贫”的政策背景下,政府帮扶首要侧重点还是持续提供保障型帮扶,增强家庭抗风险能力。具体而言,就是进一步巩固基础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的保障机制,提升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同时,根据家庭所在地区的生活标准适当提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2)本文发现发展潜力不足的家庭(如缺乏资金、缺乏技术、就业技能不足而陷入贫困)并不能从精准扶贫政策中获益,这一类家庭在发展型方面的需求相对更高。所以,需要加大开发型政策支持力度以帮助脆弱性家庭改善在发展型消费与享受型消费方面的相对福利。具体而言,是加大对家庭的就业、资金与技术支持的力度,加强普惠金融、电子商务平台以及其他数字技术方面的普及,提升家庭的发展潜力。

(3)本文强调,下一阶段的政府帮扶更应该注重帮扶政策的精准性和辅助性。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下降从长期而言取决于家庭的未来预期、家庭未来的发展潜力。因此,更重要的是帮助家庭提升人力资本素养,例如对脆弱性家庭的子女教育提供更多支持性政策、帮助提升家庭成员的数字技术技能,包括信息技术方面的基础设施投入、农村地区教育配套设施完善等。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王立勇,许明.中国精准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研究: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J].统计研究,2019,36(12):15-26.[Wang L Y, Xu M.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poverty reduc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policy: Empirical evidences from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J]. Statistical Research, 2019, 36(12): 15-26.]
- [2] 李芳华,张阳阳,郑新业.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基于贫困人口微观追踪数据[J].经济研究,2020,55(8):171-187.[Li F H, Zhang Y Y, Zheng X Y. Impa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Micro tracking data of poor population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20, 55(8): 171-187.]

- [3] 罗良清,平卫英,单青松,等.中国贫困治理经验总结:扶贫政策能够实现有效增收吗?[J].管理世界,2022,38(2):70-83.[Luo L Q, Ping W Y, Shan Q S, et al. Summary from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experience: Ca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chieve effective income increas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2, 38(2): 70-83.]
- [4] 尹志超,郭沛瑶.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家庭消费视角下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21,37(4):64-83.[Yin Z C, Guo P Y. The impa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on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household consumpt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1, 37(4): 64-83.]
- [5] 蒙媛,陆远权,陈莉.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来自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调研数据的例证[J].管理评论,2024,36(1):236-250.[Meng Y, Lu Y Q, Chen L. The effe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of poverty-stricken farmers: Evidence from survey data in the neighboring ethnic regions of Hunan, Hubei, Chongqing and Guizhou[J]. Management Review, 2024, 36(1): 236-250.]
- [6] 宋弘,罗吉罡,黄炜.教育扶贫与人力资本积累:事实、机制与政策含义[J].世界经济,2022,45(10):3-27.[Song H, Luo J G, Huang W.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Evidence, mechanism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22, 45(10): 3-27.]
- [7] 胡原,曾维忠,蓝红星,等.精准扶贫提高了贫困户的幸福感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22,(5):91-104.[Hu Y, Zeng W Z, Lan H X, et al. Doe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mprov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poor household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LDS panel data[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2, (5): 91-104.]
- [8] Viswanathan M, Alfonso Arias R, Sreekumar A. Extreme exclusion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subsistence marketplaces: A study in a refugee settlement in Nakivale, Uganda[J].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2021, DOI: 10.1111/joca.12296.
- [9] Callan M J, Sheard N W, Olson J M. 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delay discounting, and gambling[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1, DOI: 10.1037/a0024778.
- [10] Atsebi J M B, Ferrer-i-Carbonell A.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Tanzania: Relative concerns and empathy[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22, 198: 389-408.
- [11] 饶育蕾,陈地强,张梦莉.家庭消费变动的同群效应:习惯形成还是参考点依赖?[J].消费经济,2022,38(3):13-27.[Rao Y L, Chen D Q, Zhang M L. Peer effect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changes: Habit formation or reference point dependence?[J]. Consumer Economics, 2022, 38(3): 13-27.]
- [12] Chipp K, Kleyn N, Manzi T. Catch up and keep up: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n an emerging marke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nsumer Marketing, 2011, 23(2): 117-134.

- [13] Kaffle K, Benfica R, Winters P C. Does relative deprivation induce migration? Evidence from Sub-Saharan Africa[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20, DOI: 10.1002/ajae.12007.
- [14] 张雅淋, 吴义东, 姚玲珍. 住房财富“寡”而消费“不均”: 青年群体住房财富对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研究[J]. *财贸经济*, 2022, 43(3): 98–113. [Zhang Y L, Wu Y D, Yao L Z. Does the lack of housing wealth lead to consumption inequality? The impact of housing wealth on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consumption among the Youth[J].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2022, 43(3): 98–113.]
- [15] 张雅淋, 姚玲珍. 家庭负债与消费相对剥夺: 基于住房负债与非住房负债的视角[J]. *财经研究*, 2020, 46(8): 64–79. [Zhang Y L, Yao L Z. Household debt and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ousing debt and non-housing debt[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0, 46(8): 64–79.]
- [16] 李晓飞, 臧旭恒. “多轨制”养老金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J]. *经济评论*, 2022, (4): 130–147. [Li X F, Zang X H. “Multi-track” pension insurances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J]. *Economic Review*, 2022, (4): 130–147.]
- [17] Adjaye-Gbewonyo K, Kawachi I. Use of the Yitzhaki Index as a test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for health outcomes: A review of recent literature[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2, 75(1): 129–137.
- [18] Chen S H, Ravallion M. More relatively-poor people in a less absolutely-poor world[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13, DOI: 10.1111/j.1475-4991.2012.00520.x.
- [19] Ravallion M, Chen S H. Global poverty measurement when relative income matter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9, DOI: 10.1016/j.jpubeco.2019.07.005.
- [20] Ravallion M. On measuring global poverty[J].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20, 12(6): 167–188.
- [21] 吴卫星, 柴宏蕊.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消费水平均衡提升了吗? 基于消费相对剥夺缓解的视角[J]. *社会科学*, 2023, (3): 134–147. [Wu W X, Chai H R. Doe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ontribute to a well-balanced household consumption? A perspective based on alleviation of relative consumption deprivation[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3, (3): 134–147.]
- [22] 杨碧云, 王艺璇, 易行健. 数字鸿沟与消费鸿沟: 基于个体消费不平等视角[J]. *经济学动态*, 2023, (3): 87–103. [Yang B Y, Wang Y X, Yi X J. Digital divide and consumption divid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consumption inequality[J].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23, (3): 87–103.]
- [2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减贫四十年: 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 (2022)[R/OL]. (2022-03-31) [2024-01-01]. <https://www.cikd.org/ms/file/getimage/1516697201483554817>.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Four Decades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Drivers, Insights for the World, and the Way Ahead* (2022)[R/OL]. (2022-03-31) [2024-01-01]. <https://www.cikd.org/ms/file/getimage/1516697201483554817>.]
- [24] 邹璠, 周力. 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的思想演进与历史成就[J]. *财经研究*, 2022, 48(8): 4–17. [Zou P, Zhou L. Evolution of thoughts and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CPC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past century[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2, 48(8): 4–17.]
- [25] Guo Y, Zhou Y, Liu Y.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ts practices in rur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Fuping County, Hebei Province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 93: 430–440.
- [26] 栾炳江, 陈建, 邹红, 等. 城镇家庭负债存量与消费不平等[J]. *南开经济研究*, 2022, (10): 92–108. [Luan B J, Chen J, Zou H, et al. Research on the impacts of urban household debt on consumption inequality[J]. *Nankai Economic Studies*, 2022, (10): 92–108.]
- [27] 张海洋, 韩晓. 数字金融能缓和社会主要矛盾吗? 消费不平等的视角[J]. *经济科学*, 2022, (2): 96–109. [Zhang H Y, Han X. Can digital finance alleviate social contradicti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ption inequality[J]. *Economic Science*, 2022, (2): 96–109.]
- [28] Chang Q, Ma W L, Vatsa P, et al. Has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improved household welfare in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22, 44(5): 1041–1056.
- [29] 陈林, 伍海军. 国内双重差分法的研究现状与潜在问题[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5, 32(7): 133–148. [Chen L, Wu H J. Research status and potential problems of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in China[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015, 32(7): 133–148.]
- [30] 黄炜, 张子尧, 刘安然. 从双重差分法到事件研究法[J]. *产业经济评论*, 2022, (2): 17–36. [Huang W, Zhang Z Y, Liu A R. From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to event study[J]. *Review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2022, (2): 17–36.]
- [31] Chetty R, Looney W A, Kroft K. Saliency and tax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 99(4): 1145–1177.
- [32] 黄一诺, 路之纤, 余可欣, 等. 精准扶贫背景下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效果评估[J]. *资源科学*, 2022, 44(9): 1891–1904. [Huang Y N, Lu Z X, She K X, et al. Income-increasing effects of registered poor households in the contex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J]. *Resources Science*, 2022, 44(9): 1891–1904.]

Impact of government assistance on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poor households' consumption: Policy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RAO Yulei, CHEN Diqiang, FEI Zheheng

(School of Busines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has, overall, elevated the social welfare of impoverished households. However, the role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plays in improving households' relative welfare, such as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consumption, remains a subject for discussion.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carrie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assistance policies. **[Methods]** Based on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data from 2013 to 2019, this study calculated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using the Kakwani index for the surveyed households residing in a city (or province). Then, using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impact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on the relative consumption deprivation of poor households. Finally, employing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poverty, as well as consumption categorization and an interactive model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tyles, this study tested the effect of the governmen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on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s. **[Results]**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has generally reduced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consumption for impoverished households, albeit having a relatively weak economic effect. This result remains valid even after a series of placebo-tests and regressing on a matched sample set. Further classification and scrutiny of the consumption types, poverty alleviation styles, and causes of poverty revealed that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experience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consumption in the healthcare expenditure and education expenditure. This is because the welfare typ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such as medical support, housing and living assistance,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support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consumption welfare of poor households. However,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 was found in other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yp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Conclusion]** The impact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on household relative consumption deprivation was generally weak, and was concentrated in protection-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such as medical support and educational assistance. In the future, government assistance needs to enhance efficiency and optimization in development-oriented policies.

Key words: government assistanc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relative consumption deprivation; Kakwani index;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China